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研究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印度宗教文化

与回鹘民间文学

杨富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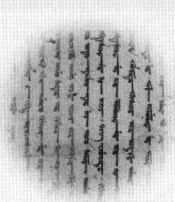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研究所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印度宗教文化 与回鹘民间文学

杨富学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杨富学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8

(敦煌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105-08504-0

I .印… II .杨… III .回鹘—佛教—宗教文学—研究 IV .I20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50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94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7-105-08504-0/G · 1637 (汉 768)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64224782

《敦煌学研究文库》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就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了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了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 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以及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住所研究并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作为和成绩。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今后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同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这样便于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以及近年或以前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采购图书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图书资料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学

生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通过对此类学生的教授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促进很大。目前留学生培养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都非常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一些经过培养的日本留学生也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出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专业博士授权点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美国学术基金项目和日本和平基金项目。敦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在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上体现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自1945年研究院成立至今,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中心。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提高，出了很多研究成果，经与民族出版社等单位协商，决定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出面组织，以“敦煌学研究文库”名义结集出版，将研究所的最新科研成果刊布出来，供学界参考。

2006 年 11 月

摘 要

维吾尔族是个善于接纳外来文明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回鹘在历史上曾信奉过多种宗教，与宗教相伴的是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特色的各种外来文化。在 9~15 世纪间，佛教在回鹘中流行，与之相伴，印度文化在回鹘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除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入回鹘文外，不少来自印度的文学作品也被译成回鹘文，对回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宗教信仰的变迁，自 15 世纪始，回鹘人逐步放弃了佛教而皈依伊斯兰教，回鹘文也随之被阿拉伯文所取代，成为不为人知的“死文字”。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敦煌、吐鲁番等地大批回鹘文写本的发现，回鹘文字与文献才重新引起世人的关注，成为认识与研究古代回鹘历史文化的绝无仅有的第一手资料。

经国内外学者百余年来研究，数以千计的回鹘文写、刻本得到刊布，其中大多为佛教典籍。

来自印度的佛教是一种想象奇幻、充满诗意的宗教，它善于把抽象、枯燥的说教寓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使不少佛经成了一篇篇优美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富有民间文学特色的就是其中的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和因缘故事（灵应故事）。这类故事在回鹘文写本中多有发现，计达二百余件，其中大多数作品已由回鹘人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进行了改编，颇有特色。此外，来自印度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如佛教戏剧《弥勒会见记》、史诗《罗摩衍那》、童话故事集《五卷书》也都被译入回鹘文，得到

广泛传播，而且对后世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在古代中原地区一直未受到重视，均无汉译本，故而这些回鹘文译本堪称遗珍。

由于受各种条件（研究者必须精通回鹘文、梵文，而且兼备佛教、文学，乃至中亚其他古代民族语言等多方面的知识）的限制，这些作品一直没有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西方学界虽有研究，但都局限于文献解读与语言学探讨，至于这些作品在回鹘中的流传与影响，尤其是回鹘对印度佛教故事的受容与改造，始终无人涉及。这些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ABSTRACT

In 840, the Uighurs Khanate (744-840) dispersed, a major branch escaped to Xinjiang and the Hexi Corridor. Since then, the Uighur Buddhist culture developed rapidly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Indian and Chinese one. They used the Uighur Script to translated and put down the Buddhist canons. However, since 10th century Uighur Buddhists became Muslim step by step, the Uighur script was discarded, and the books written in this script were destroyed deliberately.

Since the end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rchaeological team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discovered numerous old manuscripts, xylography and other historical relics dating to the 9th-15th centuries from the ruins of the ancient caves, temples, and the abandoned cities of the Dunhuang, Turpan, and other places. Thousands of the fragments had been published, which serve 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ancient Uighur Buddhism and culture for our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Uighur fragments what had been published at home and abroad, Indian Culture, especially Buddhism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Uighur literature. The essa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ven parts.

I: Indian Culture Spreading to the Uighurs and Its

Influence;

II: Uighur Versions of Stories of Buddha's Life;

III: The Uighur Jātak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Uighur Folk Literature;

IV: The Uighur Avadāna Stories and Its Features;

V: Uighur Versions of the Stories of Nidanā

VI: Uighur Fragments of the story of Rāma, a famous epic from India;

VII: Uighur Fragments of the Pañcatantra, a collection of fairy tales from India;

VIII: Story-telling in Buddhist Uighur.

序 一

我与杨富学博士相识已有十多个年头了，谋面机会虽不多，但他每出一部专著，都要赠我一册，如《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之佛教》、《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论稿》、《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等多部著作。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我也经常拜读。在我的心目中，杨博士始终是一位刻苦钻研、功底扎实、富有才华而谦虚谨慎的青年学者。

杨富学博士长期供职于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部，2002年转入北京大学随国学泰斗季羨林先生和王邦维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的邀请，邀我参加该院组织的杨富学博士后出站报告成果鉴定会，同时通报了拟参加鉴定会的学者名单，均为学界名流。本人不才，能够忝列其中，是一件幸运的事，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可以拜读期待已久的杨富学博士尚未发表的新作——《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先睹为快，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便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开始阅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于是连开几个夜车将其读毕，真是大喜过望。由于我多年从事包括维吾尔文学在内的突厥语民族文学研究，阅读过一些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有关资料，也写过这方面的论文。杨富学博士的这部专著，与我当前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我对他的课题与研究成果格

外关注。

《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一书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印度民间文学与回鹘民间文学关系的论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回鹘佛教文学的专著，拓展了维吾尔文学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维吾尔文学史中佛教文学的空白。

公元 840 年，维吾尔人由漠北西迁，定居西域之后，差不多同时建立起两个维吾尔政权：一个是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另一个则是以巴拉萨衮、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由于这两个汗国所处地域不同，周边之文化氛围截然不同，加之后来他们的宗教信仰上又出现差别与对立，东、西两个汗国的维吾尔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受印度佛教文化、中原汉文化影响至深，并以佛教为国教，佛经翻译文学以及弘扬佛教教义的戏剧、民间传说、诗歌大量涌现；而喀拉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文化则受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更深一些，由于该汗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涌现出一批具有伊斯兰文化色彩的维吾尔文学作品。从公元 9 世纪到 13 世纪，这两个维吾尔政权维系 300 年之久。这 3 个世纪，在维吾尔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转折性意义，也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维吾尔文学研究队伍中，能够解读或直接利用回鹘文文献的学者寥寥无几，至于能够驾驭“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之关系”课题的学者就更为罕见了。因此，长期以来，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一直无人进行系统的研究。

其实，我国突厥学泰斗、回鹘文研究专家耿世民教授在数年前就对回鹘佛教文学予以高度重视。有一次他曾对我说起，想合作搞一部维吾尔佛教文学史。但因我忙于其他项目，错过了与耿先生合作的宝贵机会。令人欣喜的是，从事回鹘文文献研究多年，并对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精深独到的杨富学博士，终于完成了维吾

尔佛教文学史的撰写工作。此专著的出版，不仅开辟了西域、敦煌古代文化研究的新天地，而且具有填补维吾尔文学史缺憾之意义。说句题外话，当时耿世民先生也应邀参加了成果鉴定会。在此场合不期而遇，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数年前的那次转瞬即逝的合作构想。与我的看法一样，耿先生也认为此作不仅弥补了我们个人的缺憾，更重要的是填补了回鹘学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在感到欣慰的同时，耿先生对杨博士的工作赞赏有加，一直夸奖其学问如其人品一样朴实无华。作为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者，从其与会时所罗列的一长串修改意见或建议看，他对此书是上了心的，且花了相当的工夫，其中既有对错别字的修改，也有对回鹘文、梵文字母甚至标点符号的订正，字里行间体现出耿先生大家的风范。

《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专著。科学性是此作得以成功的保证，这部回鹘佛教文学研究著作是以扎实的回鹘文文献为基础的，专著中所引回鹘文文献均有题解（注明文献出处、保存状况与研究现状等）、原文转写、疏证（内容考证与词汇注解）及全文汉译等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大部分都是首次被译成中文发表。参考文献与注释也十分详尽，符合学术规范。结构紧凑，逻辑性强，行文优美简约而准确。这样的学术著作既有科学性，又有学术规范性，更有可读性，没有一般学术著作艰涩难读的弊端，实属难能可贵，具有传世价值，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资料。

在此专著中有不少新颖的资料与创新之处。例如，对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罗摩衍那》的论述即是如此。作者刊布、译释了回鹘文《罗摩衍那》，对回鹘文《罗摩衍那》进行了考证，并与敦煌于阗语《罗摩衍那》写卷、吐蕃语《罗摩衍那》写卷、新疆的吐火罗文《罗摩衍那》写本进行比较，得出回鹘文《罗摩衍那》源于吐火罗文《罗摩衍那》的新见解。这一章的论述，显示出作

者的知识渊博，推理缜密。在“《五卷书》在回鹘中的流传及其对后世影响”一章中，也是新见纷呈。在全面译释回鹘文《五卷书》写本的基础上，探讨了回鹘文本与印度文本之间的差异，进而在今天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披沙拣金，寻找历史上残留下来的印度童话故事因子，收获颇丰，令人耳目一新。

印度的佛教故事以奇思妙想、引人入胜而著称于世，本书以专题形式分别研究了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和譬喻故事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通过回鹘文写本与印度佛教原典的比较发现，回鹘人在接受印度佛教故事时，常常要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兴趣对佛典进行取舍与改编，甚至还有重新创作的情事。经过回鹘人之损益与改编，使故事的主旨更加适应自己的需要，新作品既不失佛教故事旧有的特色，又适应了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平添了许多文学情趣，使人不免感叹印度文化对回鹘民间文学影响之深远及回鹘人对印度文化吸纳改造之微妙。

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佛本生故事。这种故事在回鹘文写、刻本中发现较多，杨富学博士对此采用了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方法，仅选择其中内容比较丰富而保存相对完整的回鹘文《兔王本生》进行解读，发现回鹘文本与巴利文本《兔王本生》及汉文本有关经典均有较大差异，惟与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七中的有关记载最为接近。除了兔王为满足梵志食用要求而不惜以身投火自焚、奉献他人这一主干情节外，玄奘还记有狐狸和猴子献供之情节，同时又有兔王升月的内容。故而可以推定回鹘文《兔王本生》最有可能是根据《大唐西域记》中的有关记载翻译而略加改编而来的。这一说法既新颖又有说服力，可为争议中的回鹘文《大唐西域记》译本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添一有力新证。

这里的兔王升月故事，早在东汉时期在我国即已形成，后来

逐步向西传播至印度，被佛教吸收而成为本生故事的素材，成为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话。这一故事在回鹘文写本中的发现，无疑可为中、印及回鹘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依据。

对回鹘文佛教譬喻故事的研究，本书选取的是广为学界所知的《折吒王的故事》。该文献在近1个世纪中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大凡研究古代回鹘文学与文献者都会涉及之，更有德国、土耳其及我国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者对之进行专门的研究，可谓成绩斐然。但此文献的经典依据何在？却一直是个谜。由于未找到原典，研究自然会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杨富学博士以其精通佛典之优势，认定该故事之基本情节与佚名氏译《无明罗刹经》中的相关内容非常接近，故很可能是根据《无明罗刹经》改编的。这里之所以使用了“很可能”三字，是因为回鹘文本在内容和结构上都与汉文本有较大的差异，说明除汉文本《无明罗刹经》外，回鹘文本另有所据（如梵文、吐火罗文或藏文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讲清楚了问题，又不轻易下断语，体现出严谨的学风。为了更明晰地凸显出文献内容与汉文本的差异及其语言特色，作者例外地对本文献采用了逐字对译的办法，这样既给读者留下自己判断的空间，又使自己的结论确立于更牢固的基础之上。

此外，本书对回鹘文灵应故事（如吐鲁番本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与敦煌本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印度讲唱文学对回鹘戏剧（如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及民间文学（如维吾尔民间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的影响以及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多有发现的回鹘文礼忏文、愿文的研究也都是非常有分量与价值的，琳琅满目，珠玑毕备，恕不能在此一一赘举。

回鹘对印度宗教文化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宗教，尤其是佛教这个层面上，文化的输入，其实是伴随着宗教的传播与推广而来

的。印度宗教的传播，直接或间接地对回鹘民间文学产生了影响。大量事实表明，在宗教观念笼罩着的时代里，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战争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出猎要举行仪式，生活上存在着禁忌，作战前要占卜，自然也就产生了对善神的敬仰和祈求，对恶神的憎恨和驱逐，从而创作出各式各样的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等，而这些故事与传说，有许多既与宗教观念相联系，也是民间文学形成的源泉，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杂糅。从《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一书看，回鹘民间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亦概莫能外。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在对佛教与回鹘民间文学关系的论述中，注重比较研究。将回鹘文献中的故事、传说与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佛教原典中的同一民间故事进行比较，以观察佛教原典中所见民间文学作品在回鹘中是如何传播、变化及产生影响的，可从中受到启发，也会有新的发现。这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其次，作者对文献资料的驾驭上，既注意对传世文献，如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佛教经典及其他传世史书的利用，更注意利用地下出土文物，尤其注重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古代回鹘文写本的利用。此外，也要注意搜集相关的吐蕃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汉文写本。以地下出土文物与传世史书互相印证，这正是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跨学科的研究，也是此书的重要研究方法。作者运用回鹘语言学、历史文化学、民间文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有机整合，力求全面、深入地探求回鹘民间文学之特色。从上述研究方法涉及学科之多可以看出，杨富学博士的学术视界是相当宽广的。

在《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一书的序言中，齐陈骏教授将其论著的特点归纳为一个“新”字。具体来说，是课题新、方法新和资料新。我想，以此三新来概括《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一书的特点，也是恰如其分的。